

隨筆

22

花城出版社



126/2

DE79/32

DE79/18

隨筆

往事漫憶

读爸爸诗想到的

——回忆爸爸董必武

董楚青 1

《滩》的始末——《滩》后记

胡子婴 6

怀念林淡秋

陈子善 10

阳光满院高歌时——忆林遐

马伯力 13

学海苦航(长篇自传笔记选载)

刘逸生 17

生活之歌

老“迷”们

李春晓 32

啊，小鹿

刘斌 40

诗文漫步

情深、意切、文采

——序散文集《爱的翔舞》

单复 44

点滴说浪漫

荆莘 49



一片冰心在玉壶(外一篇)	肖文苑	55
杜诗中的反迷信思想	李汝伦	60
《水浒》中的三“打” ——古典小说人物描写举隅	王先霈	64

人物记

艺术僧	薛家柱	68
油画家余本	王立	76
序《方楚雄画选》	迟轲	82

文史荟萃

隆中对	李建纲	85
“子恺漫画”香港展出追记	江东	89
宝海初探	郑秉谦	94
雍正之死与女侠吕四娘之谜	王云	101

哲坛撷拾

狼的喜剧	金马	105
看人类从青年走向成年(外一篇)	姜念涛	108



● ● ● ● ● ● ● ● ● ● ● ● ● ● ● ●

南粤今昔

海作陵园山作碑 杨羽仪 113

岭南风采四题 叶春生 119

五湖四海

重游香港 翁显良 126

一个中国研究生在美国(续) 翁显雄 133

木雕艺术
——菲律宾漫游散记之一 唐 挚 140

窗 口

海伦·斯诺致白夜的一封信

海伦·福斯特·斯诺 著
费元玉 译 144

母鹌鹑 屠格涅夫 著
郎永年 译 152

● ● ● ● ● ● ● ● ● ● ● ● ● ● ● ●

港澳随笔

无拘草

昌达 158

弄斧必到班门

——在伯明翰访问华罗庚教授 梁羽生 165

编 后

168

美 术

封面画

刘济荣

渔汛归来(封二)

翁富荣等

春天序曲(封二)

聂昌硕

激 浪(封三)

董树德

瑞 雪(封三)

陈天然

封底画

方楚雄

出 版 花 城 出 版 社

(广州大沙头四马路)

第二十二期

发 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厂

广东省期刊(丛刊)登记证14号

一九八二年七月出版 书号 10261·191 定价 0.52元

读爸爸诗想到的

——回忆爸爸董必武

董楚青

每逢春天，我都会想起爸爸诗集中的一首小诗：《病中见窗外竹感赋》。每每见到树尖冒出新绿，也会使我想起“昭苏万物春风里”的诗句来；如果出差，或假日在公园见到丛丛绿竹，我便不禁心头默诵起“竹叶青青不肯黄，枝条楚楚耐严霜”。爸爸共写有诗一千几百首，选入集中的有三百首，一读而不能忘的，我自己是这一首了。

我出差到山西省太原，偶然见到北大时的同学文武斌，和他聊起来，才知道他也喜欢这首诗。他也是个书法爱好者，每当有人要他的作品时，他说：“我就喜欢写‘竹叶青青’。”可见这诗拨动的不只是我一人的心弦了。然而对我说来，这诗还有一番不能忘的理由：

《病中见窗外竹感赋》作于一九五二年春天，我们家已住在小石桥了。小石桥的那所房子的院子很大很大，大致分成南北两个部分，北院是正院，南院是一座后花园。南北院由东西走向的一组房子分开。这组房子的东南角有一敞亮的房间，是爸爸和妈妈的卧室。这间屋子的南墙只有一米左右，上面就是玻璃窗，这是典型的北京老式样子的房子。爸爸用的是一架单人床，头东脚西，妈妈带着弟弟用一张双人床，头北脚南。爸爸的床紧靠着东墙，离南墙只有一步的样子。所以南墙外靠东边的一丛翠竹，它们那朝朝夕夕的轻唱和投在窗上、墙上的竹

影，对爸爸来讲，都是有生命力的，有声有色的。这些竹，爸爸想要咏它，大概也不是一日两日的了，说“胸有成竹”也许并不过分。但一直没有机缘，可能是太忙；解放初，爸爸实在是很忙的。正由于忙，一九五二年春天，爸爸得了肺炎，病得又极重，不用医生命令、妈妈劝说，高烧已使爸爸自愿卧床了。我想，病中的人比常人更容易感到寂寞，而伴随爸爸时间最多的就是竹了：微风里，她浅吟低唱，把爸爸送入宁静的梦乡；月光下，竹的清秀的枝条，从西墙拉到窗帘上；白天，日光也把竹刚劲的身影，从西墙拖到窗上——就在爸爸的床头。竹影随时而异，姿态变化万端，十分动人。记得爸爸病了几天后好得多了，照爸爸的意思，他可以下床了，妈妈却认为：“还得再躺两天。”爸爸只好整天在床上看书。记得就在这个期间的一天夜晚，从窗帘上望出去，月光洒满庭院，一片银白，树黑魃魃的在风中摇晃着巨大的树冠。风在微开的门缝中充满了寒意。我那时正病休在家，闲得无聊。爸爸生了病，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就很少外出，晚上我便和他们一起在离爸爸妈妈卧室不远的过厅玩扑克牌。那天我又在玩，玩得极其开心。正在这时，我明明听见爸爸在叫我：“女儿，女儿！”我却没有做声：实在不忍心放弃手上的一把好牌。和我玩牌的服务员同志提醒我：“叫你呢！”我还是理也不理，依然握着牌，连连催着他们出牌。爸爸见叫不应，不再叫了，也许是猜想到我不愿扔下什么好玩的吧。我又玩了几盘，才想起爸爸刚才的招呼，就跑到爸爸的卧室门口，听听屋里没有声音，我又悄悄地把门打开一个缝，朝里望望，在床头的灯下，爸爸正在躺着看书呢。我没有去打扰爸爸，轻轻地带上门。心里却顿时产生出一种怅然的感觉，这种感觉随着我年龄的增长而加深。在编辑诗选集的过程中，重读《病中见窗外竹感赋》，又使我想起了这件往事。也许诗并不是那一晚作的，但我总觉得爸爸的这首诗就是那一晚的结晶，他诗成之后就叫了我，想叫我分享他的喜悦，我却没有理

他，那一声声“女儿！女儿！”的呼叫至今犹在我耳际萦绕。

爸爸去世后一年多，“四人帮”被打倒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版我爸爸的一本诗集。出版社约请了曾在一段时间里做过我爸爸秘书的牛立志同志和我做选编工作。爸爸存的诗稿很快就铺满了桌面和地毯。我们首先按时序排好，然后认草稿上的字。“我的纸是最多的，又是最少的。”——爸爸在台历上写诗稿时，曾这样对我说过。爸爸的诗，有的写在节目单的空白处，有的写在台历背面，也有的写在什么请柬的背后的。最后，我们还要从我爸爸的诗稿中，找出哪一首是他的定稿，是他自己认为满意的诗。爸爸还有一些诗，是在发表后又作了改动的，这就更使我们费时费力去辨别了。另外他还有些诗，几经辗转抄写，一些意思也不大清楚了，还得四处去询问、查找、核对……总之，我们的选编工作开展起来了。我呢，实在不懂诗，尤其是不懂古诗，更无从谈得上爱好。但这是工作，而且是选编爸爸的诗呵！因此，我读起来总感到亲切，许多往事借助着一首首的诗，又重新涌入心头。就如《病中见窗外竹感赋》这一首诗吧，就使我我又想起初春的那一夜……想起诗中的对仗“竹叶青青”和“枝条楚楚”里，也许有我的名字的含意吧？也许是诗里寄托了爸爸对在我说来应称做母亲的那一位女同志的怀念？并向她们报告人间已有“昭苏万物”的春风，安慰她们的在天之灵吧？也许他这首诗是用以比喻那种勃勃的生命力，显示革命的热情和朝气，建国以后正如沐浴春风，祖国充满着无限生机吧？

我这些想法曾与牛立志同志商讨过，但他未置可否。然而，我越想越以为自己的想法有道理。

记得我曾就“文化大革命”中许多版本的《毛主席诗词注释》，跟爸爸有过一次谈话。我觉得《毛主席诗词注释》的每一种版本都有它合理的部分，但我又觉得奇怪：为什么有的解释又很不相同呢？爸爸偏过头，惊奇地问我：“‘诗无定解’，你没听说

过？”我当然听到过，但我以为那是后人经历各不相同，考证又各执一据造成的。那末，诗人自己的理解呢？我于是问爸爸：“比如，爸爸，您的诗呢？有没有定解呢？”爸爸望着我笑了：“诗嘛，本无定解，我写诗是出于我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并由此而产生了我的想法，用相应适当的形式表达出来。所以，我的诗表达了我对特定事物、特定环境的想法。我的诗的意思，不能强加于你，也不应当强加于你嘛。你对诗的理解呢？基于你的经历、文学修养、思想水平，会有你自己的理解，也会有一些伸发，这也是自然的。但你的，也不应当强加于我嘛。我想，诗不应该有定解才好。诗，不是算术嘛。”我觉得爸爸说的是对的。诗，以一定的文字格式，为别人提供了驰骋思想、感情的天地；大框框，诗人只勾勒出一个轮廓来。所以，我上面关于《病中见窗外竹感赋》的一些话，仅仅是我自己的一孔之见。

爸爸的诗的风格，有人说他拙，有人说他古朴，有人说他的诗象杜工部。我觉得都有些道理，爸爸的诗本不奔放，写实是爸爸诗的特点。爸爸的确喜欢杜诗，如果得其风骨，当不为怪。我觉得爸爸诗的风格就表现了他自己对文艺的观点，是他的这个观点的艺术实践。他的观点也在《溥之来书斐然有述作之志诗以促之》诗中说过：

曾经人世几沧桑
回首前尘渐渺茫
如君肯动生花笔
苦涩甜酸愿共尝

珠玑咳唾总成章
质美还嫌藻饰伤
记述不妨如实写
中和平淡味弥长

溥之姓袁，是爸爸早年在湖北的学生，现在广东省教育厅

工作。爸爸去世后，我曾去信请她写些回忆爸爸在大革命时期的文章。她因身体不好，又加之忙着负责组织和编写她爱人陈郁同志的历史和事迹的书，所以迟迟未能如愿。我原称她姨的，她不依，要姐妹相称，我又实在不敢，只好改称老师。溥之老师对爸爸始终持学生礼。爸爸在国统区工作阶段和溥之老师诗信往来极密，爸爸对延安情况的了解也多亏溥之老师去信介绍。妈妈和溥之老师的关系，在延安时就不错。

关于这首诗，溥之老师说：“在延安时曾想写写董老，终没有写成。”这就是“如君肯动生花笔”之语的由来了。溥之老师还讲：“你爸爸给我的信和诗稿我一直保存着的。我和陈郁同志到广东省来之前去看你爸爸，你爸爸要我把诗还他，我不想还，就没还。‘文化大革命’一起来，到处抄家，我就把这些文稿藏在椅子座板底下，后来我受到冲击，怕牵连老人家，给老人家添麻烦，就把文稿全部烧了，一把火烧了个精光！”她苦笑着惋惜：“我简直没有料到我能熬得过来，尤其是我自己烧了老人家留下的文稿！真不如当初还给老人家，在你们家还保险些，能存下来。”

溥之老师虽然没有写成文章，却为我们留下了爸爸的艺术见解。他正是这一观点的忠实的实践者。爸爸的诗，用辞不华丽，不是用丰富的想象去夸张，遣词造句不是以气势动人。爸爸赞扬的、讴歌的，只是“记述”，是“如实写”的，“枝条楚楚耐严霜”和“昭苏万物春风里”都是“如实写”的景致。因为“质美还嫌藻饰伤”，春天这样一个生机盎然的季节无须藻饰，藻饰则会伤质。《病中见窗外竹感赋》全诗：

竹叶青青不肯黄
枝条楚楚耐严霜
昭苏万物春风里
更有笋尖出土忙

就是以“中和平淡”取胜的。诗只是描摹了一幅竹越冬入春的景

《滩》的始末

——《滩》后记

胡子婴



抗日战争后期，我在重庆写小说《滩》，到现在已快四十年了。我写这篇小说的目的，已在我的《回忆茅盾同志二三事》一文中说过，是想通过文艺的形式，揭露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为苦难重重的民族工商业者呼吁，憧憬战后民族工商业有一个大发展的前景。现在我国阶级状况已经改变，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存在，工商业者作为国家的主人翁，和全国人民一起，都是热情奔放、尽心竭力地在为实现祖国的“四化”而努力。这是我在写《滩》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过的。

我还在青年学生时期，看到我国人民的苦难，政府的无能，特别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就经常为“如何才能使我国富强起来”这个问题而不断思索。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存在过朴素的想法，认为帝国主义所以有侵略别国的力量，就是由于工业发达；我国要富强起来，也要发展实业；而要发展实业，必须驱逐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我国有所削弱，我国的工业就有了发展，特别是纺织、面粉等日

象，不过稍微拟人化了，说竹“不肯黄”，赋予竹思想、愿望和行动，实中有虚。最后一句“更有笋尖出土忙”，使诗更生动、传神了。

用轻工业品发展更快。我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认为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我国实业就可发展，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但同时又看到从军阀到国民党的统治阶级，不但不同人民一起，反对帝国主义，而且都和帝国主义勾结，狼狈为奸，这使我感到很苦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大革命爆发，我开始受到地下党同志的教育、帮助，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的爱国者，我开始参加到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中去。对于三十年代救国会的抗日救亡、四十年代争取民主、实行宪政以及后来反饥饿、反内战等一系列群众革命斗争，我都曾不知疲劳地全力以赴，企望振兴实业，使伟大的祖国能够独立富强。我曾简单地认为，从原始社会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然后进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五种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的规律。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已进到帝国主义时期，同时由于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脆弱性，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行不通，只能由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来领导才能取得革命胜利；在民主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可以直接转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史无前例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发展。对于这个真理，当时我是理解不够的，所以，在我写小说《滩》的时候，曾认为抗日战争胜利后，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我国民族工商业将迎来大发展的春天，我们的祖国就将走上独立富强的光明大道。

但是，这种美好而天真的幻想很快就在现实生活中化为泡影。到了抗战后期，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驱逐出去，国民党政府却又勾结美帝国主义，大力培植官僚资本，民族工商业受到了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排挤和压迫，根本谈不到发展，而且危机重重，处于被消灭的边缘。我对工商界朋友中一些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经营作风，和纸迷金醉、荒淫无度的生活方式是感到憎恨的，但还是把发展实业，从而使我国富强起来的期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所以，我对于他们处在险滩暗礁上逆风行舟的艰苦奋斗是给予同情的。

我学习过一些有关社会经济的书刊，对于资产阶级是最后的一个剥削阶级，终究是要被消灭的道理，是有所认识的，但理解是很不够的。所以，在写《滩》的时候，我一方面希望我国民族工商业能有大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的前途归宿究竟是怎样的，对这个问题，我的思想是很矛盾、模糊的。

解放以后，可能党认为我同工商界有一定的联系，同时我也确有不少

工商界的朋友，所以，从解放初期直到现在，我始终在统一战线单位工作，在党的领导下，贯彻执行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政策。党采取赎买政策和团结教育的方法，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把生产资料资本家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把民族工商业者由剥削者改造为劳动人民，解决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伟大的胜利，使我在写《滩》的时期感到无法解决的矛盾问题得到了没有想到的美好答案。我在工作中学习党的理论和政策方针，也就是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我要为党的和平改造政策的伟大胜利而纵情歌唱，也为我自己能够参加这样伟大的工作，在工作中不断改变和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而庆幸。

我是一个文艺爱好者而不是一个作家。在文艺界朋友中，除了茅盾同志外，曹禺同志也是同我交往较多的朋友。他们两位都是我的良师益友。我在参加民主运动时，经常写些时事论文，在当时重庆的一些报刊上发表，感到所起的作用不如文艺形式的文章如小说、诗歌等那样大。我也想写些文艺作品，来参加当时的反独裁、反内战、争取民主的斗争。他们两位知道我有这个想法，就热情地鼓励我、帮助我。由于我同曹禺同志的寓所相临近，我们经常见面，在一起吃宵夜、坦坦面的时候，就谈论文艺创作的问题。我曾问曹禺同志：“你的剧本中的对话怎么能写得这样精辟、紧扣？”他告诉我，他是从古典文学名著中学习的，特别是对莎士比亚的剧本，总是反复阅读，把精辟的字句摘录下来。他举出一些动人的句子，就写在餐桌上放的擦碗纸上，给我示范。他开了一批名著书单，教导我先读那本，后读那本，并扼要地介绍每本书的特点，阅读时要注意什么。他的谆谆教导、诲人不倦的精神，是我衷心感激，始终难忘的。我写出《滩》的第一稿，除向茅盾同志求教外，也送请曹禺同志指点。茅盾同志直截了当地说：“这不是小说，而是政治论文，要重新再写。”但曹禺同志为照顾我的情绪，安慰我说：“第一次写小说，这已很不错了，我给你介绍出版。”对他的心意，我是非常感激的，但我一开始就毅然接受了茅盾同志的意见，予以彻底改写。终于在茅盾同志的不断帮助下，经过几次修改，完成了现在重印的这部小说《滩》。在改写过程中，曹禺同志也给予了许多指导。茅盾同志本来同意给这本小说写一篇序言；但有一天我看到一家书店橱窗内一本新出版小说的广告，用触目的大字写着“茅盾先生作序”，而作者的姓名却看不到。我不敢借重茅盾同志的声望来抬高自己，所以，这本书就没有序言。我本想写上些关于茅盾和曹禺两位对我的教导以及写作经过，也

由于同样的理由而作罢。我能够写成这本小说，茅盾同志固然花了不少辛劳，而同曹禺同志的经常帮助，同样是分不开的。继《滩》之后，应张骏祥同志约稿，我写过一篇短篇小说《绝交》，目的仍旧是为了揭露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发动内战的罪恶阴谋。以后，由于忙于日常工作，再没有机会执笔，我深感有负于朋友们的期望。

我同意把事隔多年的旧作重行出版，是由于不少同志的劝说。他们认为，小说《滩》不仅反映当时的情况，是可贵的史料，可使青年读者得到一些历史知识，而主要的还在于通过工商业者在新旧社会的不同处境，使读者看到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政策的伟大胜利。我也深深感到党的和平改造政策使当年处于重重困难，找不到出路的民族工商业者同全国人民一起，得到今日这样的幸福处境，实现了长期企求的祖国独立富强的愿望，这实在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我同意了同志们的意见，同时花城出版社的同志又提出重印我这本书，我就不顾作品的浅薄，不加改动，予以重印了。

对于《滩》这本书，茅盾同志在他自己繁忙写作的时候付出了不少的辛勤劳动，如果他还健在，看到这本书的重印，一定也会高兴的。就让这本书作为我对茅盾同志的深切悼念。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五日，北京

接：《滩》一书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人并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

——托尔斯泰

△心灵也是如此，本身如果不美，也就看不见美。

——普洛丁

△美如果有真来点缀，它看起来就要更美多少倍！玫瑰是美的，不过我们认为使它更美的是它包含的香味。

——莎士比亚

(罗玉山辑)

怀 念 林 淡 秋

陈 子 善

听到林淡秋同志逝世的噩耗，我不胜悲痛。作为一个青年文学研究者，我有幸两次面聆林老的亲切指教，那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第一次见到林老是在五年前的阳春三月，当时我正和另两位同志为注释鲁迅书信到杭州调查访问。在那之前，我已读过林老的短篇小说集《散荒》，书中对弱小者的同情，对反动者的憎恨，以及冷峻、简洁的艺术风格，深深打动了我。因此当我们听说林老就住在杭州大学教工宿舍时，真是喜出望外，但又听说他还没有“解放”，不知能不能去拜访。

于是，我们试请杭大同志代为接洽，谁知林老一口答应，欢迎我们去。那天下午，林老和蔼可亲，和我们侃侃而谈。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左联后期的革命活动，特别对两个口号论争，从产生论争的政治背景、具体经过到历史根源，都一一作了解答，还坦率地谈了他自己当时的思想和后来的认识。两个口号论争的问题，在十年浩劫中被“四人帮”搞得混乱不堪，林老以当事人之一的身份回忆提供的许多情况，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同时，林老认为只有重视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才有可能注好鲁迅著作。并且提醒我

们，许多老同志年事已高，必须抓紧时间抢救史料，把鲁迅著作中牵涉到的人和事搞清楚。林老建议我们访问住在他隔壁的孙席珍先生，访问许钦文、黄源、陈学昭等前辈和当时还戴着“反党分子”帽子的陈企霞同志，并再三表示自己与鲁迅没有直接接触过，有些问题无法解答，有些问题因时隔多年，也可能记错了，而这些老同志都与鲁迅有过交往，应好好向他们请教。

当时离打倒“四人帮”仅半年，还是乍暖乍寒的时节，而我们在林老家中却如坐春风，林老谆谆的教导，殷殷的鼓励，使我愈发感到自己从事的工作责任重大，时间紧迫。而今，注释《鲁迅全集》的工作虽然已胜利结束，林老那些语重心长的话，仍不时在我耳边回响。

前年四月下旬，我随同许杰等先生到杭州参加浙江文学学会成立会，在开幕式前，再一次见到了林老。与上次见面已相隔整整三年，没想到林老还认识我，同我热情握手，关切地询问我们注释工作的进度。我那时正在研究左联的最后一个机关刊物《时事新报》副刊《每周文学》，想到林老是左联后期三名执委之一，我在谈话中就把一份《每周文学》目录呈交林老，向他请教。林老高兴地边翻看目录，边回忆说：《每周文学》是左联为适应“新生事件”发生后的新形势，委派周立波和王淑明同志去办的，得到了鲁迅的支持，徐懋庸、何家槐同志也经常关心该刊。《每周文学》出版时间虽不长，在当时斗争中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我提到林老也曾在该刊上发表过文章，他却谦虚地表示：这些东西都很幼稚，不值得提了。经我催问，他才证实除了署名林淡秋的文章外，还在该刊上用过林彬的笔名。临别时，我请林老在百忙中再抽空看看目录，回忆该刊上一些署名文章是谁的笔名。林老考虑了一下，同意了。他最后还对我说：今天没时间多谈了，以后如有问题，可写信给我。

回沪后过了一段时间，杭大的同志转告我说，林老由于体弱事多，更由于时隔多年，虽经一再回忆，仍难以记起一些老

小 谈 文 字 广 告

邓炬云

目前，广告业正在兴盛起来。报纸上的大幅广告，电视、广播的广告逐渐多起来了，街头上也出现五光十色的广告，颇有一种面目一新的感觉。不过，这些广告特具匠心的并不多，多是构思平庸，千遍一律。

我最近在南京路上徜徉，发现上海的橱窗文字，却颇有特色，十分清新、隽永，一去枯燥之味，引人入目。有一间门面不大的工艺美术门市部，那里出售各种工艺品，其中精美的台灯很受人欢迎，橱窗里有一小段文字介绍他们的台灯：“各式灯罩 做工考究 造型别致 色彩鲜艳”。文字简洁、明了。在一间呢绒绸缎商店里，橱窗的一角有一条小小的广告：“为您服务 向您介绍一只产品保您穿后满意”，这是在给你介绍22016全毛华达呢。这比起那些大而空洞的广告文字，不是更吸引人吗？

同志的笔名，因此向我致歉，请我谅解。我这才明白林老当初为什么没有立即答应我的请求的原因，林老对回忆文坛往事，态度是认真、慎重的，尤其是对别人的笔名这种问题，如无确切把握，不愿随便推测，以免贻误后学。但为了不使我失望，尽可能的作了回忆，在实在无法确认的情况下才托人转告我。这种对同志负责、对后人负责、对历史负责的严肃态度，使我深受感动。我领悟到我们搞学术研究，推而广之，搞“四化”建设，不正迫切需要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吗？

我原以为今后还有机会接受林老的教诲，谁知那次分别竟成了永诀。我痛惜失去了一位良师，一位令人尊敬的前辈。林老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关心后学的工作作风，永远值得我怀念，永远给我以启示和鞭策。

一九八一年末